

坚持正确方向，走优质高效发展的道路

杨 小 岩

作者 杨小岩，武汉大学出版社教授，武汉，430072

关键词 编辑 坚持编辑工作的方向 编辑工作要讲政治

提 要 本文根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精神，比较深入地阐述了新闻出版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进一步分析，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一定要坚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坚持走优质高效的道路。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编辑工作者的根本战略任务。

新闻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战线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一条重要战线。对我们来说，要坚决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就是要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的精神产品，在理论观点上是科学的，在舆论导向上是正确的，在精神情操上是高尚的，在作品质量上是优秀的。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按这四条去办，我们就能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系统工程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就能说自己是讲政治，是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

一提到讲政治,讲政治方向,社会上就有那么一些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是回到过去“左”的老路上去了。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至少说是一种误解。讲政治,讲政治方向,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强调要讲政治,讲大局。1983年,在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常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6年,他在天津视察时又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从新闻出版工作的特点来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不讲政治能行吗?!如果在政治上迷失方向,不听招呼,不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说在工作中稍有疏忽,那就不仅容易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而且还有可能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我们不讲政治能行吗?!第三,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和作用来看,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讲政治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当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决定人们意识的社会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们的阶级存在。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成了不同的以致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这些反映不同阶级存在和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着剧烈的斗争。在任何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总是要用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巩固自己的政权,并继续保持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为了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鼓吹超阶级、超党性的意识形态,这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障眼法罢了。他们不是竭力标榜“思想言论自由”吗?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言论必须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和理论,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他们的死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无产阶级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一再宣称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现阶段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政治。我们党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应当理直气壮地为这个政治奋斗终身。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的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展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光辉前景,也为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进一步搞好自己的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前,我们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是这样一些重大的课题:在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在全社会努力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在扩大开放,对外交往日

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有效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的“西化”、“分化”阴谋；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来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有效地遏制精神垃圾的传播泛滥。必须看到，这些重大课题，又要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大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这样一个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加大了问题解决的困难程度。这对我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二

讲政治，讲政治方向，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而且作为商品生产的精神产品的物化生产过程又直接受着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这里确实也有经济效益的问题。经济效益好，有助于精神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有助于宣传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它不仅为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还会给精神生产部门积累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给精神生产者带来必要的经济利益，这就是经济效益为什么成为不少精神产品生产者都十分重视甚至追求的根本原因所在。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也好，两个效益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不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些高品位、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专著，或者说一些读者面很宽的各种层次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不仅印数大，而且重印快，有的一年就达到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受到读者的广泛的、热烈地欢迎，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很大的社会效益，这样两个效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对作者，对读者，对编者，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功德无量的。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文化市场的日益繁荣，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这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情况和势头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精神产品，又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生产的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比如有些精神产品，直接的经济效益可能不大，甚至几乎没有，或者说要赔本，但它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用很大，它有很大的社会效益。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就别无选择，决不能因为它的经济效益不大，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不对它们加以重视，给以支持。在这里，必须指出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东西——我们不愿称它为精神产品，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低，有的甚至包含有黄色、淫秽的内容，但它们发行量很大，其经济效益比较大甚至很大，越是如此，对读者和社会的危害也越大，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也别无选择：决不能因为经济效益比较大，甚至很大就对它们加以重视，给予支持。一句话，面对这样两种情况，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我们的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决不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去赚取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脱节,甚至背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不可能统一的。从实践上来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情况也是不少的。比如那些印数大、重印快的各种层次高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得较好自不待言,就是那些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高层次、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传统文化丛书也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上日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有大量的事实作根据的。现在,我们的责任是要进一步在促进两个效益有机统一的结合点上多下功夫。从理论上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们更好地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要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奉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讲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精神产品,既然具有商品的属性,那么它到市场上去实现自己最大的经济效益,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我们的出版物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二是我们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是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前提下的生产,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社会效益,也就是说,我们的出版物的这种特殊的商品属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点给我们实现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作出了质的规定,说明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可能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有很大的难度,还需要我们做许多工作。首先,要进一步研究宣传文化领域的有关政策,特别是文化经济政策,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增强新闻出版单位的活力,同时要形成有利于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环境和条件,对一些全局性的重点的精神产品生产的系统工程给以适当的经济资助;对精神产品的生产单位在税收政策上给以必要的政策优惠;对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单位自身——出版社来说,要提倡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统筹安排,优化经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少出版社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是应当大力加以推广的。

三

正确处理质量和数量的关系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新闻出版事业繁荣和健康发展的又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现在困扰着我们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精神产品的质量,特别是图书的编校质量问题,更是令人担忧。新闻出版署和各省局组织的几次图书编校质量大检查结果,问题相当严重。从最近的一次大检查来看,没有一本优质图书,良好图书只有一本,占被检查图书的 2.857%,合格图书 6本,占 17.14%,不合格的图书 28本,占 80%。图书编校质量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普遍关心。

为什么在图书质量问题上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呢,原因固然很多,图书出版的数量失控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近十几年来,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的确过猛,出书品种从 1978年 1万多种一下到现在的 10万多种,甚至更多。这些图书之中,当然不乏精品,不乏传世之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占相当大的数量的是平庸之作,是交叉重复出版。数量上的失控,必然导致质量上的滑坡。

那么数量上的失控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一些出版单位的情况来分析,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选题论证把关不严。这是首要的原因。在选题论证的过程中, 天秤的法码往往不自主的向经济效益一方倾斜, 形成了实际上的只要有钱就能出书的不良倾向。一大批不好不坏的短效、平庸的选题列入了计划, 而一些社会效益极佳, 经济效益不显著, 或者赔本的重点项目则被淘汰出局,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 往往干脆对选题计划谈不上什么认真的论证和筛选, 只是把每个编辑个人申报的选题收集起来, 加以归类, 实际上把选题优化变成了选题的凑合。另外, 还有一种情况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中干扰。

从有的老上级、老领导那里, 往往又使选题计划的数量进一步扩张, 政策导向上某些偏差, 这是重要的原因。

比如制定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 经营责任制, 等等, 这都是很正确的, 在实践中也是卓有成效的, 有些单位有时往往过多的强调了量化标准, 特别是在发放超定额酬金时, 没有注意向质量和效益方面倾斜, 势必导致一部分编辑一味追求数量, 超负荷运转的倾向。

在贯彻调整结构, 优化选题, 控制品种, 提高质量的方针上下力气不够, 品种数量猛增, 而印数和印张数却徘徊不前, 甚至实际上由于品种的增加而下降。

我们应当从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 当前的重要任务是要把图书品种的数量适当压缩, 而把图书印制数量和印张数量尽快搞上来, 并使今后的图书印刷数量和印张数量随着图书品种数量的逐步增加而不断增长, 这才是我们应当全力追求的目标, 也才是我们的出版社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是最根本的一条, 还是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确保宣传文化事业特别是新闻出版事业坚持以内涵发展为主, 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上来。

: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 新办法, 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

那就是坚决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精神,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并在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的关系, 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了, 我们就能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 新办法, 就能在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责任编辑 谭辉霞)